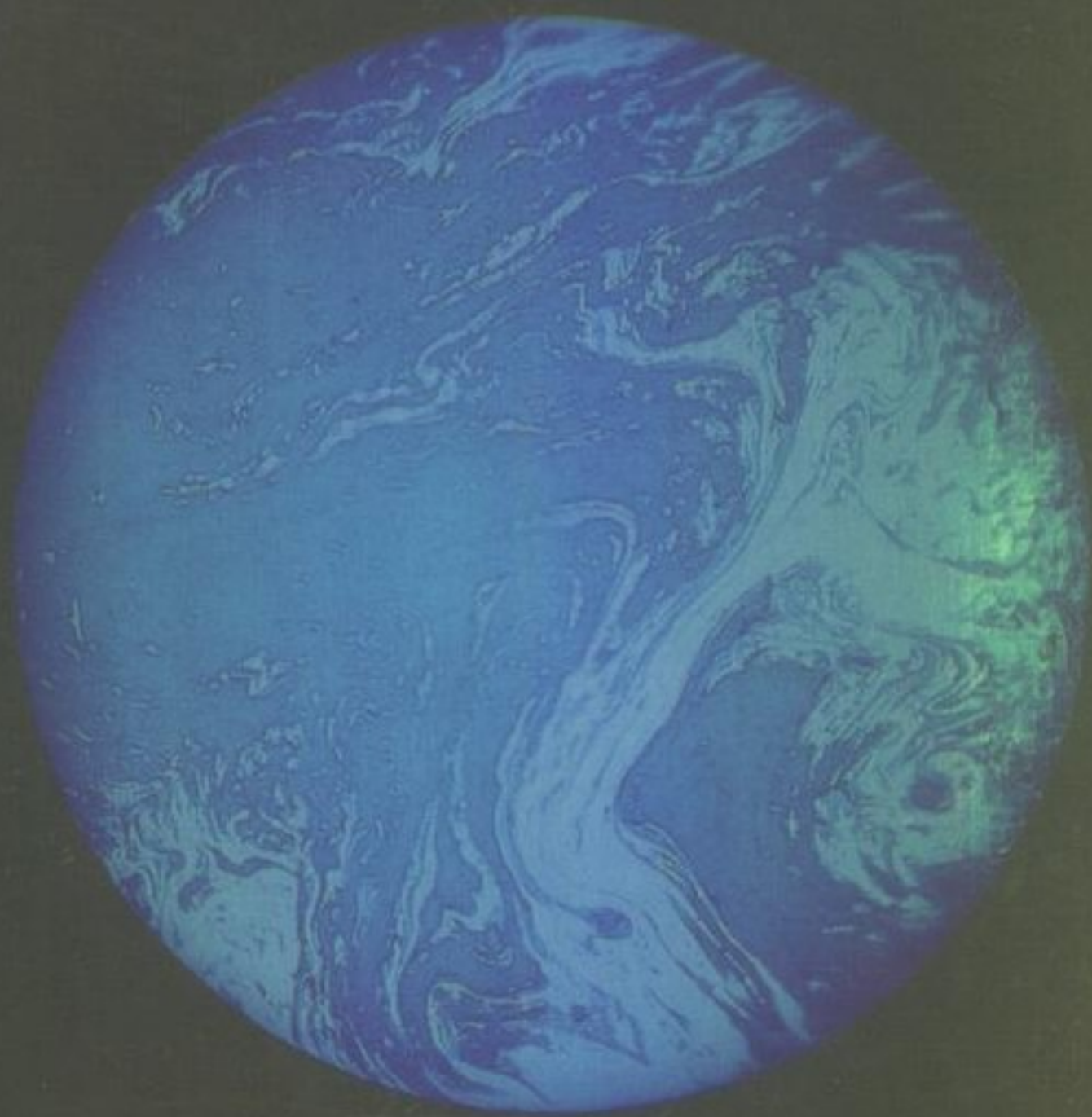


# 中国古代的“士”

延涛林声著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304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 中国古代的“士”

延涛林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中国古代的“士”

延涛 林声 著 责任编辑 郭兆麟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125 字数147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215-02010-X/G·262 定价：4.90元

##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顾问	胡 绳	马 洪	任继愈
	张岱年	季羨林	汤一介
	冯 契	梁披云	
主编	许 明	刘春建	
常务编委	陈燮君	杨匡汉	
	俞吾金	汤学智	黄晓峰
编委	钟哲明	乔仁毅	姜 涛
	王小盾	陈晓明	谢维和
	房 宁	刘月莲	陈智英
总策划	赵 燐		

##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 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二三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20世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历史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族主

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噬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80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的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五·四时期诞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忱，深刻地影响和主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年代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的是一群40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80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着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8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

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 导 言

士，这是一个古老的名称。

何谓士？善于追根溯源的学者作过许多考证，或引《左传》中“人有十等”之说，证实士乃贵族的最低等级；或引甲骨文之卜辞，论证士乃卜巫之类；或引秦简汉牍，证明士乃商周武人之称谓；或基于古籍中对农工商贾均有称士之习惯，断言士乃古代男子之总称……士之本义何指，我们不拟考证，也无意于对上述诸说妄加评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孔夫子那个时代之后，士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称，我们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来研究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是值得研究的。

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相联系，士人阶层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倘若从孔子办私学算起，他们已随着中华民族跋涉了两千数百年的漫长历程。在历史的每个章节中，都留下了士人的足迹，他们对历史曾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人们应当去思索，去研究，从中找到有益的借鉴。

士人是和知识、智能相联系的。他们应当用他们的知识和智能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事实上，人们可以从春秋战国时的“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礼贤下士”的口号和实

践，看到士人的杰出贡献。站到时代前列、厉行社会改革的是士人，面对现实、为“匡世救时”而大声疾呼的也是士人……从哲学、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们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充分表明了知识的力量。

在秦汉之后的封建社会中，每当由乱入治的岁月，都有一些才智之士在奋发进取，或运筹以定乱，或奋袂于战阵，他们的知识和智能一次次地得到发挥。即使在专制社会的和平时期，许多士人或“规画赞襄”，或“拾遗补阙”，或为民请命，或以死醒民，就连被鲁迅、梁启超等大师贬斥为“替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辉。此外，还有照耀中国古代文明史册的辉煌的文学成就，睿智的军事杰作，浩瀚的史学论著，领先于世的科技立说（包括中医中药学），差不多每一个领域都有士人圈中的佼佼者展其雄姿，显其才华。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曾为世界所惊叹，所倾倒。西方有人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归纳了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这些发明创造者中有工匠，有宦官，有宫女，有村民，更多的则是士人，这是中国古代士人聪明才智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是，一般地罗列这些事实，重复这类现象，难免有“老生常谈”之嫌。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古代优秀士人是在什么样的客观条件——社会历史背景下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考据学家也曾断言：某些时期明君当政，正是太平盛世，从而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个论断不知被多少人重复了多少遍，其中自然蕴含着不容辩驳的道理，似乎用不着再去重新论证了。

不过，事实总启发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深层思索。中国古代，许多科学界的大家和思想界的巨星，并非都是在明君当政的“太平盛世”升起。据吕振羽先生所著的《简明中国通史》所载：自

两汉至明清出现的天文、历算、数学、科技发明、医学等专家近80人，其中绝大多数或在王朝林立之际，或在颠沛流离之中，或在穷困潦倒之时，或在纷争攘夺之岁。这是为什么？

这里，我们绝无歌颂乱世之意。毫无疑问，乱世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事实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中国古代士人的发明创造及其它方面的贡献与封建政治制度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联？

马克思曾经说过：“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揆诸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君主制的原则”难道不正是从“占优势”步向“天经地义”的么？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所谓“忠臣不事二君”，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君为臣纲”等等通行千古的信条不正是君主制原则的体现么？在这里，为民为臣的士人也必然受到这类原则的支配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士人的伟大创造与专制政治的关系呢？

毋庸讳言，在各个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士人不但在芸芸众生中是小数点后的小数，即使在士人群体中，也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在多数士人身上，并没有能显示出知识和智能的力量。他们的知识只不过是个人猎取官爵、富贵的工具罢了，他们大都谋求加入专制统治者们的行列，（只是真正能达到光宗耀祖者不多就是了！）何尝与社会、与民众有什么相关！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地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贡献，第一次把知识提升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

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6页）

知识的地位，也便是知识阶层的地位。因为知识是通过知识阶层积累、升华、传播而发挥效益的，是知识阶层劳动的结晶。虽然这个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不能摆脱被驱遣、受奴役的地位，虽然他们不能不充当着资本的工具，无法自主，但是，无可否认，相对于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从总体上考察，他们确实获得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地位。

然而，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士人也就没有得到历史提供的、运用个人知识和智能的良机。从总体上看，历史安排他们写下的是另一部历史，一部令人叹息而又发人深省的历史。

在中国封建社会，说士人阶层从来没有受到重视也许是不公正的。不管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作为士人之祖的孔夫子始终被尊为“圣人”可谓明证。自汉代推行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实行科举制，各王朝无不重视选拔士人做官，尤其是北宋之后，任官必用读书人，可谓又一明证。还可举出很多例证。然而，事物的表象和实质如果处处重合，辩证法不就成为多余的了？

重视知识、重视士人当然无可非议，但这只不过是表象，实质是，重视的是什么知识，重视的是士人运用这样的知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刘邦当皇帝后，大宴群臣，功臣们或“饮酒争功”，或醉酒狂呼，“拔剑击柱”，对他这个皇帝颇有点不敬，于是用士人叔孙通制订朝仪，仪成，群臣再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毋敢喧哗失礼者”。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为此，他赏了那位士人一个太常（九卿之一）的官衔，赐金五百斤，他对士可谓是重视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用“乾德”作为年号，一个偶然的场合，他手下一位饱

学之士告诉他，五代时，蜀中有个亡国之君也曾用过“乾德”这个年号，赵匡胤大约以为不吉利，改了年号，并且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他对士人似乎也颇为重视，而且要传下去。这类明君英主对士人的这种重视，能说是士人、是知识的幸运么？

封建帝王们对士人的重视当然不止上述之类，其实更多的则是煞费苦心地算计，别出心裁地处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铁手腕，为的是根而绝之；汉高祖“溺儒冠”的恶作剧，则是为了斥而远之；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新花样，唐太宗引导士人“入吾彀中”的老圈套，明太祖的严刑峻法，清王朝的文字狱……历代统治者如果不是出于对士人的过分重视，又何须如此费尽心机？！

类比虽是简单的研究方法，但却能给人某些特别启示：被封建时代奉为“千秋师表”的孔夫子曾经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什么？因为他们“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圣人之训”是否有道理我们不去管它，但是，这恰恰被讽刺性地演化成了历代许多“圣明天子”对待孔门士人的不成信条的信条。在他们心目中，士人的地位原不过如“小人”或“女子”一般，在历代统治者钦定的正史中，“妇人之见”同“书生之见”总是相提并论，就是见证。所以，帝王们对士人的重视总是陷入两难的选择之中，远不了，近不得；既要用，又惧怕。那些仇视、蔑视知识阶层的往往不独是王朝末期的暴君荒主，大多倒是历史上的所谓明君英主。上面说到的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雍正、乾隆等等，何尝不都是颇有作为的君王。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是，帝王们越是有作为，他们对士人的束缚、钳制便越是花样百出。尽管其手法各有差异，或以阎罗手段施之，或以菩萨面孔诱之，但目的无不相同。梁启超就曾一语点破，明太祖设八股文钳制士人，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异曲同工，“遥遥两心，千载同揆”。这个说法大抵是不错的。即以那些以

温和手段引导士人“入吾彀中”的帝王而言，他们对士人的重视大约如同驯马，务去其桀骜之性，驯而服之，役而使之。而士人大都也就在这种调教、役使下生活、演化、适应、迎合，消磨壮志，丧失人格，淬灭才华，自泯价值，知识遂与历史进步绝缘，其力量也便因此付之东流了。

封建时代的明君英主往往标榜“任人唯贤”、“礼贤下士”，能说对士人不是真心实意地重视？可是，又何以总是言与行相悖，差之千里呢？道理并不复杂。中国封建社会本是宗法社会，任何帝王总要把维护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当作“百年大计”，视为至高无上。维持之法无它，唯有独裁一途最受垂青。而要独裁，便要建立个人的“一尊权威”，排斥一切他人（包括士人阶层）的独立追求、独立思考的价值活动。秦始皇要“别黑白而定一尊”，集大权于一身，士人稍有异议，就难免被诛而坑之，讨而戮之；明太祖分封朱姓子弟为王，以“拱卫王室”，读书人直言其弊，就难免被下狱而死；曹氏要篡汉，对孔融等人的明嘲暗讽便不能听而任之，无动于衷；司马氏要篡魏，就不能不对嵇康等人罗织一个风流罪名，捕而杀之……就事论事，其中或有是是非非。然而，从宏观上考察，无论秦始皇指摘士人削弱皇权，还是明太祖责难士人“离间骨肉”，无论对孔融者流以“不孝”治罪，还是对嵇康之徒以“清谈误国”论处，都不过是口实，实则无关罪名本身的大或小，仅仅不过是为着皇权的绝对权威，为着“家天下”统治的不可动摇，作一条注释而已。

在动物遗传和进化学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起着绝对作用，“适者”的指令一代代地传下去，形成某种动物的固定习性，有的亿万年不改其性。人类社会则完全不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段落，比如中国两千余年的漫长封建岁月，人们也能看到封建专制君王们以其“顺则昌，逆则亡”的特殊强刺激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精神王国，形成一种只属于那

个时代的“动力定型”，即使如知识者阶层，也终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其印记，而不可能超然于时世之外。这大概就是中国士人不能将其所拥知识及其智能淋漓尽致地造功于社会的史因所在吧！

中国的士人阶层是一个多类成份组构的复杂群体。对其认识不宜简单化，对其评断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做多类型、多层次、多侧面的具体的分析。随着封建社会的崛起、稳固、没落，古士阶层也走过了比较自主，到完全依附，再到沉沦的历史一幕。尽管这样，在封建社会历史篇章的每一节，士人总是良莠杂陈、善恶并存的。我们的分析，就是着眼于此的。随着本书章节的逐步展开，读者会从中看到具体脉络的。至于会否为读者认可，我们是既不苛求，也不奢望的。我们只想说出我们之所想。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士人有其自身的弱点。这是历史造就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经济因素构筑了封建专制政治赖以兴衰、存续的根基，从而也规定了古代士人历史命运的轨迹。他们在中国“国民阶层”尚未得以充分发展的时代而早临世间，决定了他们与国民阶层之间的距离较大。秦汉之后的封建专制统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先天不足”者阶层的缺陷。士人所固有的思维定势的弱点导致了自身的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以及只会在历史陈迹中寻找现实问题答案的偏颇；他们对政治的过分狂热，矢志追逐，自然而然地使其演化成了专制政治的附属品……总之，社会历史的“造化之功”使得士人顺理成章地成了专制统治下的驯服的工具和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以其特殊形式表现的代价强化了专制政治，其影响所及几乎覆盖于全社会。

中国特殊的国情造就了一个颇为特殊的士人群体。但是，面对他们的特异历史足迹，人们用不着去作无可奈何的叹息，更不必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完全否定它，需要的倒是实事求是的思考，

客观公正的分析。尤其在社会历史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今天，人们完全有可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俯瞰历史，审度历史，清醒的对待，公允的评断，对古代的士的历史作用、社会地位、固有传统取扬弃的科学态度，该肯定者肯定之，该否定者否定之，继承发扬其积极面，抛却铲除其劣根性。这本小册子倘能给人以某种启示，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 目 录

导言 .....	( 1 )
第一章 骄子 .....	( 1 )
一、李生 .....	( 2 )
二、博识 .....	( 9 )
三、匡世 .....	( 18 )
四、竞技 .....	( 25 )
五、忧患 .....	( 31 )
第二章 轨迹 .....	( 37 )
六、直观 .....	( 39 )
七、向变 .....	( 45 )
八、位移 .....	( 52 )
第三章 沉浮 .....	( 59 )
九、尊儒 .....	( 60 )
十、仕途 .....	( 67 )
十一、道德 .....	( 74 )
十二、人格 .....	( 81 )
第四章 民魂 .....	( 91 )
十三、勇士 .....	( 92 )

十四、巨星 .....	( 99 )
十五、断裂 .....	( 108 )
第五章 群图 .....	( 115 )
十六、角逐 .....	( 116 )
十七、皇臣 .....	( 122 )
十八、畸儒 .....	( 131 )
十九、忠廉 .....	( 138 )
二十、尽节 .....	( 143 )
二一、奸佞 .....	( 148 )
第六章 外向 .....	( 159 )
二二、引入 .....	( 161 )
二三、冲突 .....	( 167 )
二四、句点 .....	( 174 )